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張伯偉 主編

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

劉玉珺 著

中華書局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張伯偉 主編



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

劉玉琨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劉玉珺著.—北京:中華書局,2007.7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張伯偉主編)

ISBN 978 - 7 - 101 - 05751 - 5

I . 越… II . 劉… III . 漢語 - 古籍 - 文獻學 - 研究
- 越南 IV . 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98866 號

責任編輯:李晨光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

劉玉珺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

*

880×1230 毫米 1/32·16 1/4 印張·2 插頁·40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39.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5751 - 5

總序

張伯偉

十六世紀以來，在一些西方的文獻中，往往提到中國人有這樣的自負：他們認為惟獨自己纔有兩隻眼睛，歐洲人則祇有一隻眼睛。這些記載出自英國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國的伏爾泰也曾謙遜地認同這種說法：“他們有兩隻眼，而我們祇有一隻眼。”用兩隻眼睛觀察事物，是既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為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仁”，本來就是著眼於自我和他者，本來就是在“二人”間展開的。不過，當大漢帝國雄峙於東方的時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謂的“仁政”，實際上所成就的却不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圖像。政治上的冊封，貿易上的朝貢，軍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過這樣的過濾網，兩隻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過是自己在他者身上的投影。這與用一隻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

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呢？

從十三世紀開始，陸續有歐洲人來到東方，來到中國，並且紀錄下他們的觀察和印象。於是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逐漸有了一个不同於自身的他者，也逐漸獲得了第二隻眼睛，用以觀察周邊和遠方。不僅如此，他們還讓中國人擦亮了第二隻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漸漸認識了自己。不過，這是在中國人經歷了近代歷史血和淚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後的事情。

同樣是承認中國人有兩隻眼，但在德國人萊布尼茨看來，他們還缺少歐洲人的“一隻眼”，即用以認識非物質存在並建立精密科學的“隻眼”。推而廣之，在美國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及周邊各地區人的觀察中，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中國，也必然是色彩各異、修短不齊的形象。我們是還缺少“一隻眼”，這就是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正如一些國外的中國學家，曾把他們觀察中國的目光稱作“異域之眼”，而“異域之眼”常常也就是“獨具隻眼”。

然而就“異域之眼”對中國的觀察而言，其時間最久、方面最廣、透視最細、價值最高的，當首推我們的近鄰，也就是在中國周邊所形成的漢文化圈地區。其觀察紀錄，除了專門以“朝天”、“燕行”、“北行”及“入唐”、“入宋”、“入明”的紀、錄為題者外，現存於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漢籍，展現的便是“異域之眼”中的中華世界。這批域外漢籍對中國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呼應，對中國古籍所提出的問題，或照著講，或接著講，或

對著講。從公元八世紀以降，構成了一幅不間斷而又多變幻的歷史圖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經濟、思想、宗教、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醫藥、民間信仰和習俗等各個方面，系統而且深入。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域外漢籍不僅推開了中國學術的新視野，而且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新材料”，從一個方面使中國學術在觀念上和資源上都面臨古典學的重建問題。重建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新貌之獲得，有賴於當時的新材料和新觀念，用陳寅恪先生的著名概括，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域外漢籍可大致歸入“異族之故書”的範圍，但其在今日的價值和意義，已不止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於“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為中國文化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所以，域外漢籍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成為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正是本著這一構想，我們編纂了“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其宗旨一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總之，我們期待著從“新材料”出發，在不同方面和層面上對漢文化整體的意義作出“新發明”。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宋儒曾把這兩句詩看

作“浩然之氣”的形容；“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唐代鑒真和尚曾因這四句偈而東渡弘法。我願引以為域外漢籍研究前景和意義的寫照：它是四方仁者的“同天”，是穿越了種種分際的交匯，是智慧的“結緣”和“對語”，因此，它也必然是“生香不斷”的光明事業。

是為序。

序

王小盾

《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原是劉玉琨的博士學位論文。聽到它編入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即將出版的消息，我有一種不平常的感受——是高興，但也不止於高興。對於劉玉琨來說，這是她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對於我來說，這是我十多年來指導的最後一篇博士論文：這都是讓我們高興的理由。而超出高興的感受則是某種沉重。因為我知道——下面還會談到——在這本不太厚的書中，包含了可能超出一般人想象的艱辛。

劉玉琨是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第九屆博士研究生，2002年秋季入學。她前面幾屆同學大多是做音樂文學研究。這一年，考慮到發展域外漢文學研究的需要，也考慮到她有跨文體研究的基礎（碩士論文研究銘文），我遂建議她以越南漢文學研究為專業方向。她對此有些猶豫，因為她自幼喜愛藝術，原來的興趣正是音樂文學；不過，她後來還是接受了我的建議。

我的想法不能說沒有道理。在我看來，域外漢文學研究是一個朝陽學科。按照“有一門新發現就有一門新學問”的道理，它代表著新的學術資源，勢必衝擊傳統學術，而成為知識的新疆土。讓一些青年英俊進入這樣的學科，顯然有助於學術發展。另外，在越南漢文學研究方面，我們也稍稍有了一些資料基礎。1998年，我曾與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上海大學張寅彭教授訪問越南，盡力帶回來一些漢文古籍資料。後來，我又安排過幾次和越南學者的中長期互訪，共同編出了一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每一次交流活動都

會增加我們的資料庫藏，也會提升我們對越南文化的了解。至少，越南漢文古籍資源情況如何，我們對此是心中有數的。

在我的樂觀情緒感染下，劉玉珺迅速調整了學習的思路。在入學的第一個學期，她就配合相關課程，實施了以“中越書籍交流史研究”為中心的學習計劃。她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很好，學習很主動。除文獻學的經典著作以外，她通讀了各類古代書目和現代圖書館目錄，從中鉤稽出了與越南有關的條目；她把《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翻查了一遍，考察了其中關於合刻、合編、合訂、同書異名的條目；她從各種期刊中找到一百來篇有關越南的學術論文，一邊閱讀，一邊思考了書籍史研究和中越文化交流研究的相關問題。她的讀書範圍很廣，涉及二十四史中的周邊民族傳記，歷代《會要》、《通典》、《通志》、《通考》的外交部類，以及中華書局版的十七種中外交通史著作。她按“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傳統方式安排學習，努力學會從形式的角度和歷史學的角度看“書”——這和過去習慣的文學的角度不同。她自然遇到了不少困惑，但她將其一一排除了。她的學習狀態，可以用“如饑似渴”這一成語來形容。

這個開頭還算順利；不過，從第二個學期開始，困難和挫折就悄悄來臨了。

按原來的計劃，這是我們在越南工作的學期。我們的目標是：既為修訂《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作準備，也為將要撰寫的學位論文收集資料。我們一行四人——劉玉珺、朱旭強、何仟年等三位博士生和我——早在幾個月前就為這次旅行作了許多籌劃。但剛剛出發，問題就來了：由於揚州大學國際交流處的失誤，只有我和持上海護照的朱旭強如期到達河內；何、劉兩位則因簽證的問題受到阻攔，在中越邊境滯留了半個月。接下來，2003年2月底，當我們在越南漢喃研究院聚齊，摩拳擦掌地打算大幹一番之時，另一個問題出現了——我們的複印申請被取消了。我們只好改變計劃，把重點轉

向古籍較少但在管理上相對寬容的越南國家圖書館。這兩件事大大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效率。事實上，屬於我們的只有一個不完整的三月，或者說只有二十來個工作日。三月下旬，一場黑色風暴侵入越南，然後進攻整個世界。面對這個名為“薩斯”的空前未有之物，我們只好草草收兵。但即使這樣，劉玉琨的成績單仍然是豐滿的：在河內，她閱讀了四十多本越南舉業文集，為之撰寫了提要；她閱讀了幾十種屬於經部和集部古籍的科舉作品，修訂了若干相關條目；她與朱旭強合作拍攝了一批越南古籍，這主要是喃文俗文學古籍。回國後，她又分類整理了幾次從越南帶回來的文集序跋資料，以及越南目錄書資料。

看起來，我們所遇到的困難和挫折就這樣過去了。但是，對於劉玉琨來說，它們卻轉化成了潛在的危機：她失去了就某一專題收集資料的機會。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劉玉琨和我多次討論過博士論文選題的問題。我們設想過幾個題目，例如中越書籍交流史研究、書籍形成史研究、在比較的意義上建立越南古典文獻學，以及越南文獻和敦煌文獻的相關性研究。為什麼要設計這些比較宏觀的題目？其中有一個原因：對於這些題目來說，劉玉琨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有重要意義的。但這也同時意味著，劉玉琨不可能按通常的論文方式——掘井的方式——進行寫作了。她面對的材料比較分散。她就像站在春天已開凍的冰河上：擁有很多冰塊，但卻沒有足以保證她的安全的那一塊。

對於劉玉琨的處境，也許我估計得簡單了些。在我看來，“不安全”的研究應該是學術的常態。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是以求取新知為目標的，因此，必定要以實驗——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的嚐試——作為基本工作方式。面對越南漢文古籍研究這樣一個學術新領域，宏觀的資源調查及材料研究是所有工作的基礎，無法等到條件全部成熟。研究方法多種多樣，正如 20 世紀初許多學術先

行者所表現的那樣，可以用粗綫條的描寫作為繪製新的學術藍圖的手段。另外，越南本土資料的不足可以用中國境內的資料和具有相似性的資料——例如敦煌寫本資料——來彌補。於是，我按原來的設想，鼓勵劉玉珺通過尋找新資料的方式來擺脫困境。“你現在遇到的資料不足的問題，過去敦煌學家們也遇到過”。我對她說：“從羅振玉、王國維、劉半農到向達、王重民、任半塘先生，都是在資料極有限的情況下推動敦煌學的。他們的方法是拿到一點材料就往前走一步。你也可以這樣。”

劉玉珺於是開始了四處尋找資料的艱苦歷程。2003年下半年，她住在北京，編寫了北京各公共圖書館所藏的越南古籍目錄、中國重抄重印本安南書目、安南本古籍目錄、和刻本越南古籍目錄。她閱讀了各大圖書館收藏的以越南為主題的各種古籍。她通讀了國家圖書館所藏日本影印的二十冊《大南實錄》，並通過電子資源，收集了四庫全書中的越南資料。她從小在桂林長大，北京的飲食氣候對她來說都過於僵硬。她害怕暈車，常常空腹乘坐公交車前往圖書館；為了節約時間，又常常省略中午這一餐。她的腸胃逐漸變得不太好，長期的超負荷工作，又使她開始心悸、失眠。她只有通過服藥來維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在北京的調查結束以後，她又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桂林等地圖書館收集相關資料。到2004年春天，在學位論文開題的時候，她增加了中國公私所藏越南古籍書目、中國歷代書目中的越南古籍、中越書籍交流史料匯編、中越文化交流史料匯編、越南書坊刊刻書籍統計、越南古代書目叢刊校錄、敦煌遺書分類目錄等資料項目。當然，她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劉玉珺的學位論文開題報告在導師聯席會議上得到了好評。她完全應該借此休息幾天。但是，她還沒有來得及鬆一口氣，就意識到，真正的嚴峻纔剛剛開始。因為她所面臨的寫作，是要把一種新的理念付諸實施。這一理念，簡單地說，就是依據越南古籍的特

殊形態，探索那個非經典的知識世界，從而改進傳統的文獻學。但問題是，她所熟悉的全部表述方式，包括她所面對的材料，卻無一例外地接受了經典的改造。怎樣去探索呢？很難，既需要經驗，也需要特別強健的邏輯能力和自我批判能力。其次一個問題仍然是資料不足。因為再簡單的結論都要以具有質量的歸納為基礎，所以充分佔有資料是學術工作的基本原則。可是，劉玉琨的越南古籍研究卻在遠離越南的揚州進行；而國內所存的越南古籍和關於越南古籍的資料，儘管作了充分發掘，其數量卻仍然很微弱。2004年初，我受學校委派，到韓國擔任一所大學的客座教授，做《高麗史·樂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她來信說：在寫作每一個章節的時候，“都感到了置身於一個資料匱乏的研究領域，卻發現身邊孤獨無一人的恐慌”。

這一年出現的波折很多。概括起來說就是：環繞劉玉琨的情緒，主要是無奈和焦慮。對於她的無奈，我還是能夠理解的，因為我也有過。在越南，我們通常要用一個月的時間等待一份複印申請被批准。這段時間，我們只好在兩種不同的工作方案之間徘徊。越南古籍分佈在許多不同的圖書館中，其中一些圖書館，要費很多周折纔能走進它的大門；我們也只好等待。1997年，我和趙塔里木在中亞研究東干文學時也有這樣的情況：知道許多材料的存在，但卻沒有能力去利用這些材料，例如用俄語寫成的材料。我們只好轉向其他材料，重新從田野調查做起；這樣一來，我們所能使用的材料就非常有限。到了研究階段，我們被迫採用了特殊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加用中國西北地區的材料作為比較，另一方面加用個案分析來補充歸納方法的不足。趙塔里木的博士學位論文就是通過這種比較研究完成的。在那段時間，我們總是有身陷泥沼不能移步的無奈。但是，劉玉琨所承受的壓力和焦慮，卻是我未曾經歷的。比如有一個壓力是知識面的壓力：為了認識古籍所鈐印記，她要學習篆刻的知

識；為了加深對喃字的認識，要讀關於古壯字的書籍；越南古籍涉及的門類很多，她因此要去閱讀經學、術數、藝術、西學、神話、教育、地理等各方面的書籍。她的時間顯得太不夠用。另一個壓力則來自校方關於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的規定。對於她來講，這是件兩難的事情。有一些極優秀的刊物（比如《文史》、《域外漢籍研究集刊》）適合發表她的成果，但它們都不算核心期刊；通常的期刊比較歡迎熱點文章，而她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法卻遠離熱點了。這使她面臨一個特殊的矛盾，即學術之要求和學術刊物之要求的矛盾。應該寫形式漂亮的文章呢，還是應該繼續資料積累和資料考訂呢？她在動筆之時常常覺得無所適從。

事實上，隱藏在上述矛盾之後的，還有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在報考博士研究生之前，原是有一份優越的工作等着劉玉珺的，但她爲了一個模糊的學術憧憬，就放棄了。她來到揚州，原以爲學術研究就是平靜而充實地讀書；卻沒有想到，作爲某種先驅者，她必須進行“上窮碧落下黃泉”式的尋覓。她將要實踐的學術理念比較超前，而且有一半是來自我這方面的，她必須將它和她從材料中得到的認識結合起來；但她對於這種結合卻缺乏經驗。而且，似乎所有求職受挫的消息和外界對這個課題意義的不理解，都在否定她的理想和理念，使她變成了孤軍。她的論文寫作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進行的，每天都像是在幾個方面同時作戰。不過，正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樣，儘管她從來沒有擺脫過現實生活的壓力，也從來沒有消除過焦慮，但她通過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放棄通常人的娛樂和享受所作的努力——克服了困難。我想，她的精神資源大概是誠實和認真。因爲誠實，她沒有敷衍自己所尊敬的學術；因爲認真，她沒有降低自己的選擇。

2005年5月，劉玉珺如期交出了博士學位論文。這份成果是令人滿意的。它不僅用充分的論證闡明了文獻形態是文化個性的反

映這一主題，而且，在構思的縝密、結構的完整等方面，還超過了我的預想。它獲得的成績也是在意料之中的。答辯委員的共同評價是：“這篇論文選題獨特新穎，既是對傳統文獻學的開拓，也是對域外漢學的開拓，極具學術價值和難度。它對漢喃古籍產生的背景、過程、應用及傳播情況作出了清晰的梳理與系統的歸納，對漢喃古籍的刊刻方式、文獻特色有深刻的認識與合理的評價，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重要意義。尤其是通過對漢喃文獻與敦煌文獻的對比研究，提出‘俗文本文獻學’概念，代表了一套不同於傳統文獻學的理論體系與學術方法。作者不僅對文獻材料的收集、考辨用力甚勤，而且能在此基礎上加以理論提升，顯示出作者敏銳的學術眼光與深厚的理論素養。全文材料豐贍，視野廣博，是一篇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我也參加了答辯會，感到這篇評價的每一個字，都有沉甸甸的份量。

現在，劉玉珺的論文就要出版了。對於她四年多的辛苦，這是一個難得的安慰。而對於本書的讀者，論文之後的背景故事，則有可能成為某種啟發。它說明古人稱為“作”——“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覺而已先覺……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為作”——的那種書是存在的；也說明學術書並不都是在“安全的和安靜的”書齋中寫出來的，其中相當一部分經歷了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過程，其實是生命和苦難的結晶。書架上擺了很多書，我們要把這種書找出來。讀它，不僅能讀到新知，而且能讀到充沛的智慧和心靈。

而對於我來說，劉玉珺的故事則是持續的震動。故事裏面隱含了某種殘酷，這使我懷疑自己關於學術的觀念和標準是否過於矯情。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畢竟是可以買賣學位的時代，是把學術當作謀生之手段的時代，是平庸更宜於流通的時代。但故事的核心卻是一種特殊的堅貞。這幾天，我把自己教過的學生想了一遍，想到好些和劉玉珺相似的故事，心中不禁生出感激之情。因為我的觀

念和標準也是由這些學生培養出來的。孔子說“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既然教學可以相長，那麼，豈止學生，做老師的不是也有“小知”、“大受”之分嗎？

至於劉玉珺自己，我相信，這些故事會成為她的財富。樂觀地看，它們意味著生命的拉長和加強，意味著人的智慧和毅力所能達到的高度，同時，它們也總是聯繫著一些美好的事物，比如河內的清晨。——當我們騎著自行車，穿過一個個柳枝輕拂的湖泊，趕往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的時候，我們就像是去認領自己的家園。因為那一屋一屋的寫滿漢字的手抄本，同我們有特別的親近。只有走進這個環境，我們纔知道什麼叫作“祖國”。事實上，無論我走到哪里，我都忘不了這一幕。越南是一個較晚向世界開放的國度，真正進入它很難。越南尚不發達，越南傳統文化研究舉步維艱。但從另一面看，這應該不會影響越南研究的魅力，正如險峻的山峰不會挫敗登山者的熱情。我其實也是這樣一個登山愛好者。我願意以這一身份預言：當新的勇士再次來到這座山峰之下時候，《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和即將編成的《越南漢文古籍總目》，不僅是他們最重要的階梯，而且會是一種高度的象徵。

2007年2月12日，在海東

目 次

序	(1)
緒 論	(1)
第一章 古代中越書籍交流.....	(20)
第一節 中國典籍在越南的傳播.....	(20)
一、漢籍向越南傳播的途徑	(21)
(一) 北屬郡縣時期	(21)
(二) 獨立自主時期	(25)
二、漢籍在越南的流佈狀況	(33)
第二節 越南漢喃古籍北傳概觀.....	(41)
一、流傳於中國的越南漢喃古籍	(42)
(一) 經部	(43)
(二) 史部	(43)
(三) 子部	(51)
(四) 集部	(51)
二、越南古籍北傳之方式及影響	(65)
第三節 影響中越書籍交流的文化因素.....	(73)
一、佛教的傳播與文獻交流	(74)
二、儒學教育與漢籍傳播	(84)
三、人員流動與特殊形式的文獻交流	(91)

第二章 越南古籍的刊刻與抄寫	(96)
第一節 越南古籍的刊刻	(96)
一、印刷術的南傳	(96)
二、安南本的刊刻系統	(102)
(一)官刻	(102)
(二)民間刻	(108)
(三)私刻	(115)
(四)其他	(122)
三、刊刻系統簡圖及結語	(130)
第二節 安南本的刊刻形式	(131)
一、安南本的種類	(132)
二、安南本的版刻特色	(135)
第三節 越南古籍的抄寫及抄本類型	(144)
一、抄寫在越南古籍當中的應用	(145)
二、越南古籍的抄本概況	(149)
三、抄本類型	(152)
(一)簡單複製本	(152)
(二)重新編抄本	(156)
第三章 越南古籍目錄研究	(160)
第一節 越南古籍目錄編修概況	(160)
一、越南古籍的遺存與收藏	(161)
二、古典目錄的編撰特點	(169)
第二節 目錄分類與越南學術流變	(183)
一、四部分類在越南的演變	(183)
二、越南本土典籍與西書的分類	(190)
三、經學典籍的分類及其結構變化	(200)